联合国 S/PV.4736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十八年

第四七三六次会议

2003 年 4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墨西哥）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保加利亚	塔夫罗夫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智利	巴尔德斯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法国	杜克洛先生
	德国	舒马赫先生
	几内亚	布巴卡尔·迪亚洛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兰先生
	俄罗斯联邦	斯米尔诺夫先生
	西班牙	梅嫩德斯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迈克达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议程项目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

03-31118 (C)

下午 3 时 20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粮食危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时达成的谅解，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

就这样决定。

我请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代表安理会热烈欢迎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今天是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听取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詹姆斯·莫里斯先生介绍情况。介绍结束后，成员们可向莫里斯先生提问。

现在我请莫里斯先生发言。

莫里斯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十分感谢让我荣幸地代表世界粮食计划署参加安理会今天的会议。

今天我来是谈非洲，或许主要是南部非洲。但同安理会所有成员一样，世界粮食计划署非常关心伊拉克问题。自 1991 年以来，本署一直在伊拉克工作，而且自从 1995 年后期以来，一直是石油换食品方案的一个重要执行者。在我介绍后，欢迎成员们就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伊拉克的工作提出问题或意见。

本署在伊拉克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为伊拉克境内 2 700 万人口提供粮食，每六个月费用 13 亿美元。有意思的是，我今天的任务是谈非洲，非洲有近 2 亿人口营养不良，5 000 万人口面临严重危险，尤其是妇女与儿童。伊拉克人民一直有不少的政府食品供应。今天我可以告诉安理会，伊拉克境内多数家庭有一个月的存粮。相比之下，如果非洲部分地区人民家中能有一个月存粮，他们真不知会高兴到什么程度。事实上，世界上有点双重标准。为什么在世界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决不能接受的痛苦与绝望，发生在非洲，我们却能坦然处之？我认为，决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非洲粮食危机，原因基本上仍象我 12 月介绍的——连续干旱、经济政策的困难和失败、敌对行动与冲突，加之艾滋病毒/艾滋病异常、几乎无法限量的影响，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非洲预算将达 18 亿美元。让我告诉各位，这等于 2002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全球预算总额。

在全世界，过去十年全球的粮食援助承诺大幅度下降，从 1999 年的 1 500 万公吨，下降到去年不到 1 000 万公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可以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除中国，长期饥饿人数实际上在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告诉我们，饥饿仍然是世界上健康不良的最大因素。

也有佳讯。秘书长科菲·安南已经把非洲饥饿问题列于他的议程之首。其次，法国和美国正在八国集团范围内共同努力，让世界集中关注非洲的粮食危机。希拉克总统将把该问题放在八国集团六月埃维昂会议议程之首，布什总统已宣布建立一个 2 亿美元的新基金，预防非洲饥荒。

在南部非洲，而且一定程度上在非洲之角，艾滋病对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日益严重。一月份，我曾同秘书长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特使斯蒂芬·刘易斯一起重访这一地区。我们对艾滋病对施政和粮食部门的影响，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深感震惊。非洲大量的政治和技术人才在死亡或者外流，非洲人力资源在大流血。已有 700 多万非洲农民死于艾滋病

毒/艾滋病。而艾滋病毒/艾滋病在非洲的影响高峰期要到 2005-2007 年才开始。

没有可行的农业推广服务，怎能转变粮食生产状况？父母病魔缠身，无力传授，农村儿童怎么学习农作？新教师培训跟不上教师死亡率，如何维持儿童基本教育制度？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与赞比亚总统的一次交谈。他当时说：“吉姆，你能够为赞比亚人民做的最重要事情是帮助我们培训教师。去年，在赞比亚，艾滋病毒/艾滋病导致我们 2 000 名教师死亡，我们只能填补其中的一半”。

好消息是，由于许多国家的慷慨帮助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非政府组织伙伴和联合国其他重要机构的努力，我们在该地区向 1 000 多万人运送了 62 万多吨粮食，从而避免了严重的死亡和饥饿。

转基因粮食问题已经逐渐消失，不再拖延或中断粮食的运送。南部非洲地区需要援助的六个国家中有五个国家正在接受经过加工和碾磨的转基因粮食。如果没有在转基因问题上开展建设性解决问题的努力，我们绝对不可能达到目前的粮食运送水平。

粮食计划署仍然特别关心津巴布韦。在那里有许多新闻媒体的报导指出，粮食援助正在被政治化。我们相信，对我们的粮食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接到关于有人滥用权力的可靠报告的少数几个情况中，我们停止了那些业务。我曾六次与穆加贝总统会晤，而且我们主动提出可由联合国提供服务，监测与核查政府在那里分配的粮食，但是我们迄今未收到肯定的答复。通货膨胀、政府对粮食部门的垄断以及土地重新分配计划的影响很可能意味着粮食状况不会很快在津巴布韦稳定下来。

我们的目的不是使津巴布韦的粮食援助政治化，而是使它非政治化。应该在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向所有人提供粮食，任何其他考虑都是绝对不适当的。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每个地方的情况。不能让饥饿的人们陷于政治混战之中。有人希望我们在发生危急情况时撤走，以惩罚政府，并在政治或人权问题上采取立场。但是粮食计划署认为，不能让紧急援助政治化，不论是好是坏。在掌握权力的人——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叛分子——不让某些脆弱居民获得粮食援助时，我们将大声疾呼。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作用是中立的，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非常类似，但我们的成员国也要求我们充当饥饿者的代言人。这使我们如走钢丝，长期需要保持平衡。在政府采取经济行动，例如禁止私人贸易或垄断粮食进口——这些做法危害到粮食部门并加剧饥饿——的时候，我们的成员国期待我们站出来说话，而我们是会这样做的。

关于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苏丹——非洲之角——的情况，那里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数目与南部非洲相当。在南部非洲，有 1 500 万多人处于危险之中，其中一半的人在津巴布韦。在埃塞俄比亚，超过 1 100 万人绝对处于饥饿危险之中，另有 300 万人处于险境的边缘：占居民的 20％到 25％。

在厄立特里亚，情况要困难得多。这个国家较小，居民也较少，但是在 330 万居民中，有 220 万人绝对处于危险之中。冲突使情况更加复杂，军方中有许多人尚未重新融入其家乡。

显然，在非洲之角，干旱是罪魁祸首。在埃塞俄比亚的需求方面，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回应，但是我们在厄立特里亚的工作却仅得到一般的回应。就埃塞俄比亚而言，很有趣的一点是，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它所得到的人均紧急援助额是最高的，但人均发展支助额却是最低的。我最近有幸前往那里，走访了一些社区。在那里，价值数百美元的粮食在以工换粮方案中得到适当使用，帮助社区规划它们的未来，思考土壤和土壤侵蚀以及拦蓄水的问题。它们进行了规划和准备，它们将摆脱这一危机。在实践当中，它们建立了社区的领导层，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为这些社区提供出色的服务。

与此同时，在几英里外，这类准备工作——在预防和发展方面投资——并没有做，他们处于灾难之

中。在埃塞俄比亚可能有 1 万个社区需要这种帮助。我们目前正在 800 个社区开展工作。

在西萨赫勒——毛里塔尼亚、佛得角、冈比亚、塞内加尔和马里——粮食安全状况也出现恶化，大约有 100 万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感谢许多成员国在我们的预警粮食反应系统中所作的投资。以前我们没有做好应付 15 年前埃塞俄比亚境内问题的准备。在建设新的早期反应系统、评价系统和监测系统之后，我们现在应付危机的准备工作比以前要好得多。

同样位于南部非洲的安哥拉境内的问题略有不同。该国经历了 30 到 40 年的冲突和武装暴力。好消息是，现在那里已经实现和平。粮食对于恢复安哥拉的经济以及维护和平来说，极其重要。我们原先打算在安哥拉为一百万人提供粮食。今天，我们正在为 180 万人提供粮食。到 6 月份，这一数目将为 220 万人。安哥拉是一个在长期上需要建立实质性农业制度的富裕国家。

关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开展了合作。提供粮食是我们的责任。今天，在非洲，我们正在为 180 万难民和 5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粮食。其耗费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不能适当开展这一工作，那么它可能造成的动荡将对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在非洲西部沿海地区，这是一个尤其棘手的问题。各成员都注意到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的问题。那里有 400 万到 500 万难民——人们在四处迁移。冲突正在该区域造成严重混乱。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粮食计划署已提醒各方注意，由于缺乏资金以供提供急需的粮食援助，非洲 120 多万难民的命运仍不确定。在一些地方。我们不得不将口粮配给减少一半或 25％。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阿尔及利亚和苏丹这些非洲主要难民收容国，人们担心粮食运输线会出现严重中断。

几星期前在联合国这里，我们与八国集团举行了一次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会议。秘书长作了开幕发言，我们在会上谈到世界需要做哪些工作，以使非洲事务有一个更稳固的工作基础。我们谈到，非洲人自己终将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将对自己本国的国内政策负起责任。全球贸易方面的问题需要适当解决，不能让它们成为抑制非洲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和出口的重大因素。

我们当时向八国集团提出的具体要点如下。

首先，我们需要捐助者在更好地确定目标和更先进的预警系统的基础上更坚定地致力于紧急粮食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完全是靠各国的自愿捐助。我们没有从联合国方面得到核心资助。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机构，我们的年度预算超过联合国在纽约市运作的预算。我们 90%的资助来自九个国家加上欧洲共同体。还有 20 多个国家现在有能力帮助我们，而且许多国家目前有农业剩余，能够通过提供商品来帮助我们，但它们并没有支付运输的资金。

我们已寻求各种方式来将有资金的国家和有商品的国家配成对，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如何能够使这种做法产生成效。这种作用是巨大的。印度已承诺为阿富汗提供 100 万吨小麦，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为阿富汗 100 万学童生产高能饼干。我们需要来自能够帮助运输在印度所生产小麦饼干的国家的帮助。我们第一次得到俄罗斯联邦的很好支持。我们正在努力使新的伙伴加入我们的方案。

第二，需要大幅度增加对基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支持，包括微观和宏观方面，特别是灌溉基础设施，而且也包括道路和市场。也必须让妇女更容易承担农活。在非洲，妇女承担 80%的农活。在非洲受艾滋病毒/爱滋病感染的人当中，妇女现在占 58%。她们被期待着生产粮食和提供食品。她们被期待着照料家中或区域内染上重病的那么多人。世界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使农业生产让非洲妇女更容易承担。

我曾有好机会与马拉维农业部长会晤。他说，“吉姆，世界可以为我们做的最重要事情将是把大约7 700万美元投资于一个可以为马拉维全国服务的灌溉系统。”马拉维是一个有大湖泊和巨大水利资源的国家，一个妥当建设的灌溉系统将以非常实质性的方式解决其农业问题。秘书长关于非洲进行一次绿色革命的呼吁是最近所发表的最重要讲话之一。

第三，我们建议资助一项 3 亿美元的非洲粮食紧急基金，这将是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即可动用的一个立即反应帐户。我们的紧急反应账户目前已有 3500 万美元，我们的经验表明，即将出现危机时可立即用来投资的这些美元，可以让家庭维持其农场，而不用出售其应对机制；一开始的一点帮助的价值等于稍后进程中的大量帮助。

我也应当指出，在南部非洲的危机中，我们非常成功地筹集资金和商品来满足粮食需求。在筹集粮食以外物品的资源方面我们并不是那么成功。饮水和卫生、保健、医药、防疫和教育问题完全与粮食一样重要，无论如何，捐助社会——作为粮食计划署的负责人，我对此很感激——发现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于粮食，而更难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它问题。耕作工具、种子和肥料方面所作的投资有巨大的作用，并有助于让人们重新立足。我愿鼓励成员们审视这些问题。

我提过非传统捐助者的问题。

最后，让我指出，我认为我们也许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我们为学校提供营养餐的工作。世界上有 3 亿饥饿的儿童。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在 2015 年之前将饥饿和贫困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世界上有 8 亿饥饿的人，其中将近 40%是儿童；一半儿童不能上学，其中大部分是女童——我们能够作出的单项最重要的投资是为儿童提供教育。受教育的儿童会成为更好的公民、更好的教师、更好的父母、以及更好的农民。不管人们选择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社区的质量。

我们知道如何用每年大约 35 美元来为一个学童提供营养餐。以每年不到一个美元，我们可以用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所倡导的特殊保健措施来减少蠕虫和其它各种严重的保健问题。去年，我们为 1 600万儿童提供营养餐；我们需要为全世界一亿儿童提供营养餐，我们需要为非洲另外 5 000 万人提供营养餐。这将是我们能够在全世界进行的一项单一的最大投资，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开始扭转非洲的未来。

我对帮助我们的许多国家的感激心情是无法描述的。上星期，我接到来自加拿大的最值得一提的电话，加拿大承诺今后三年提供 7 500 万美元用于为学童提供营养餐。我刚对瑞士进行一次很好的访问，瑞士承诺再为一万名学童提供营养餐。我们正在努力让私营部门加入我们的工作。荷兰一家拥有 15 万名员工的大公司——TPG 公司——承诺其每一名员工负责一名学童的营养餐。如果我们对此考虑周全并想出各种办法来包括广泛的范围，我们将有机会通过为学童提供营养餐来改变这个世界。

我希望强调维持和平与外交的至关重要性。在非洲与在其它地方一样，战争和冲突迅速导致饥饿。饥饿和没有粮食的人会有冒险行为，更会采取敌对行为。战争和冲突降低生产力，加剧艾滋病毒/爱滋病，增加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并对儿童产生显著的影响。战争改变国家间打交道方式的重点。毫无疑问，在非洲大部分地区，饥饿和贫困正在加剧冲突，正在剥夺非洲人应当享有的光明未来。对我们而言，他们的痛苦不会比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所看到的痛苦少。我们都必须作出更大努力来给予帮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就一个直接影响到大量人口的问题所作的及时和非常相关的通报。

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今天下午我们有一长串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希望充分利用莫里斯先生出席的机会。因此，我请安理会成员将发言严格地限于必要的问题和评论，以便本次会议能够成为一次互动的交流情况会议，而不是一次表态的会议。

坎宁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莫里斯先生。这的确是关于这个非常、非常困难局势的一次很好的介绍。我也要感谢他的辛勤工作，并感谢他的组织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辛勤工作。

令人遗憾，莫里斯先生所概述的是迫使我们处理短期问题和长期案例的一种紧急情况的各种因素。在其评论中，他指出使这种局面更为棘手的许多其它因素：人为的复杂情况、粮食的政治化、战争的影响等等。我们同莫里斯先生一起反对把粮食当作武器，并且特别对艾滋病毒/爱滋病出于他所描述的许多原因所造成的影响感到不安。

我想问莫里斯先生的问题是：有鉴于此，他最近向捐助者发出的关于这场危机的信息是什么？得到的反应是什么？根据他的评估，2003 年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满足的需求是什么？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我要说，我们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杰姆斯·莫里斯先生同我们在一起感到非常高兴。他向我们谈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相关的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洲粮食危机。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听到去年 12 月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粮食计划署的活动面临的重大障碍：天气情况，健康/卫生状况、艾滋病毒/爱滋病和那些也可被视为人为的障碍，例如：社会混乱、冲突以及施政问题。

主席先生，为了响应你发出的抓住问题的要害的呼吁，我要问莫里斯先生的问题如下。1999 年延长了粮食计划署的任务，以使计划署成为发展的工具。事实上，当时要求粮食计划署利用粮食援助主要地、并且作为一项优先事项，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这是首要的目标。其他目标涉及所谓的紧急情况。在此类情况中，需要满足成为人道危机受害者的难民和人民的即时需求。

目前，应急职能和目标事实上好像是粮食计划署目前工作的主要核心。旨在预防紧急情况的主要职能如何：即利用粮食援助来支持发展行动？这是我向执行主任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粮食计划署的新任务。我们赞扬粮食计划署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紧急情况中，包括今天在伊拉克如此有助益。但是，这并不会阻止我们谈论任务的实质，这就是支持发展行动以预防紧急情况。

巴尔德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莫里斯先生所作的通报，以及他今天向安理会提供的宝贵的信息。

正如先前的发言者提到的，人们只能够对任务的规模、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在处理诸如莫里斯先生所描述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局势之类的紧急局势中所面临的困难留下强烈的印象。像坎宁安大使一样，我们想知道，在不确实知道——至少我们不确实知道——会员国实际提供的捐款将会有多少的情况下，粮食计划署今天如何能够面对一种影响 1 100 万居民的紧急情况？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将同坎宁安大使提出的问题相同：鉴于像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这样的局势，我们能够指望得到什么援助以处理这场重大危机？

第二，清楚的是，当人们说长期饥荒正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以及在世界上饥荒仍然是造成急病和缺陷的主要原因时，我们正在处理的是有关制度的问题。正如喀麦隆大使所说的，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同发展政策和如何处理这些政策有关。联合国有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具。几十年来，我们在联合国内部设立了各种机构，其职能是评估发展中国家局势，并且试图特别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出反应，而这些反应与这一国际制度如何能够处理这些问题有关。我要问莫里斯先生：他对这一点是否有任何进一步的想法。

最后，尽管充分意识到非洲局势的严重性，但莫里斯先生在开始发言时解释了粮食计划署正在伊拉克执行的任务。我要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应举行另一次会议，使莫里斯先生能够直接谈论这一问题。

舒马赫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莫里斯先生做了非常精彩的介绍，并且特别感谢他持续不断地努力向安理会通报。我要对他最初提出的一个看法表示一点质疑，他说，我们惯常地接受一种非洲局势，但是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却不会接受同样的局势。我们是否真正地惯常地接受这样一种非洲局势？请允许我说，这是否更像是一种捐助疲倦症？

我正确地记得，大约十年前，在南部非洲发生了另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国际社会非常有效地响应了粮食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发出的处理这场危机的呼吁。现在，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局势。

莫里斯先生提到有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艾滋病毒/艾滋病和食品危机——他和其他人模糊地提到了人为的问题。不是有三种造成这种可怕的混合体的相互纠缠的因素吗？这种混合体使我们几乎无法处理这种世界范围的问题。施政不良、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食品危机的混合体，不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吗？

在这方面，我有如下一个问题。莫里斯先生是否同意：不对在世界范围建立善政采取健全的做法，任何对付艾滋病毒/艾滋病或食品危机的孤立的努力不仍然是零星的办法吗？我要再次提到：善政是我们各国元首三年前通过的《千年宣言》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不幸的是，它并未列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标题之下。我非常希望在今后对该问题的讨论中把千年发展目标说成是呼吁捐助国帮助我们应付这些问题的理由时，善政这一第三项内容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与要同其他人一道对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出色的和全面的通报表示谢意。我们意识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很多危机中——包括在邻国阿富汗——完成的杰出工作，我们对该组织十分敬重。

在我们今天下午所听到的介绍的范围内，我们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非洲的食品危机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的特别联系。我非常想知道莫里斯先生是否对这种关系究竟如何存在有任何想法——是否是消极的存在，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建立。

莫里斯先生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使食品援助政治化，而是使之非政治化——例如在津巴布韦——并应当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向所有人提供食品。我认为，这完全是正确的。但例如，我们能不能利用提供食品援助——食品安全——作为在非洲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所面对的一些危机中解决冲突的动力？在不使之政治化和不剥夺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的情况下，能否把不仅提供食品援助、而且包括提供农业援助、发展和技术支持用来作为非洲和其他地区解决冲突的因素？

其次，我谨向莫里斯先生提出一个或许更直接的问题。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正隐隐呈现干旱和冲突。他认为干旱如何加重了冲突或起到相反作用？我认为，埃塞俄比亚得到的食品援助或许比厄立特里亚得到的援助更加慷慨。对此有任何原因吗？如果有，它们是否与正在展开的冲突有关？这是从通报中得出的一些想法。

最后，我谨表示，我支持我的同事巴尔德斯大使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关于伊拉克局势的类似通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给莫里斯先生回答所提出问题的机会。这将使那些要提出莫里斯先生已经回答的问题的安理会成员跳过这些问题，集中于他将给我们的答复。我请莫里斯先生发言。

莫里斯先生（以英语发言）：对于我认为是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应当指出美国在 2001 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 60％以上的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我们一直争取发出的有关南部非洲的最新信息——顺便提一下，我完全同意德国代表关于领导能力和善政的看法；它们是一切的中心和根本——儿童的问题使我们不堪负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 1 100 万艾滋病孤儿。津巴布韦有 78 万名孤儿；马拉维和赞

比亚有 40 万到 50 万名孤儿。一半的家庭的户主年龄在 65 岁以上，一个 5 名儿童的家庭由一名 14 岁的女孩做家长并非罕见，而这个女孩的身高同我 7 岁的孙女一样。全世界对这些儿童的教育、食品和健康负有艰巨的责任。

这也对各国政府和各机构的人力资源机构带来毁灭性影响。我提到了教师的流失以及人力资源的耗尽和丧失。我们此刻谈到的是补充制度。南部非洲的医疗工作者——医生、护士和药剂师、基本上没有了。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才能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必须集中注意儿童和人才。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是严重的。去年在这六个国家中有 50 多万人死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非洲有 3 000 万人受感染，比去年增加了 3.5%；津巴布韦 34%的成年人口受艾滋病毒/艾滋病影响，在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有与之相似的数字。

我们一直集中注意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农业投资的重要性，并注意扩大捐助国基础的重要性。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责任照顾自己，但我们对其他地方的那些比我们糟糕的人都负有一些责任。我们将非常努力地扩大我们的捐助国基础。我们将需要 380 万公吨食品来完成我们今年在非洲的工作；我们将需要 18 亿美元，加上我们去年未得到的 3 亿美元。

我们 10 个最大的捐助方中的八个去年大幅增加了它们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我们需要这种支持不断增加。我们需要新的捐助方，我们需要私营部门的帮助。

关于喀麦隆所提问题——我们在雅温得设立了一个区域办事处；喀麦隆一直是一个伟大的朋友——十年前，我们的支持中的 80%用于发展。今天，我们支持中的 80%用于紧急救济。我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不是一位科学家。但是我们同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今天我们所开展的自然灾害行动比 1965 年增加两倍，比 1990 年增加一倍。

发生了变化。大概资源有限，资源被用于使人民存活下去并被用于减少在紧急状况情况下的人类痛苦。在紧急状况下，我们尽最大可能保证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长期的发展影响。如果我们使一名儿童吃饱饭并鼓励该儿童去上学，这就是发展。如果我们使一名儿童吃饱饭并增加食品内容中的碘、维生素 A 或铁等成分，这是对该国长期的人力资源发展。我们一些最为重要的投资用于粮食换工作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我们向那些参加重建社区基础设施的人们提供资源，使他们有饭吃。这样社区得到好处，家庭得到好处。

令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是，今天我们资源中仅有 20%用于长期发展，即用于预防。这对于象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来说是个大问题；对于全世界也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智利同事提到一个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所需援助的问题。我们的计划一直是为埃塞俄比亚饥饿人民的 40%提供食品，其余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通过双边方式解决。我们已筹措约 2 亿 500 万美元。我们干得不错——我们大约已筹集我们所需要的 70%的资源。厄立特里亚的问题更为困难一些。我们希望筹资 1 亿多美元，但所得到的回应不到 20%。我们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合作良好。

关于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有关冲突问题，我的感觉是，目前在厄立特里亚军队内仍有 90 万士兵，正在对其进行遣返。没有农业工作所需要的人力一直是厄立特里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我认为，冲突使问题更加恶化，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为农业和保健对早期预警系统、评估系统和监测系统进行投资极其重要。这便涉及到尽快了解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和为此做好准备的问题。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投资，以便在此领域做得更好。技术是有的。在分析问题所在时，过去我们仅看粮食问题。但随着我们今天作评估和分析某个问题的严重性时，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其他问题。

我完全同意我的德国同事的意见。管理和领导问题是一项重要职责。例如象津巴布韦等某些国家现在面临非常艰巨的问题。我对于今年马拉维和赞比亚的农业局势更感乐观，因此对莫桑比克、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也是同样。在津巴布韦受到威胁的人民的数目有所增加，农业生产没有增长。没有有助于进口的外汇。那里私营部门不起作用。捐助方在那里的确能够发挥作用。如果要扭转局势，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有有力的领导。

巴基斯坦有关将和平与安全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的问题绝对是有的放矢。在我头脑中毫无疑问，饥饿的人民同不饥饿的人民行为有所不同。当人民吃得饱饭并开始知道他们的生活是有希望和机会的，并且在希望、机会和未来中生存，他们便不大可能采取暴力行动。显然我们已经谈论过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人士问题。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粮食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解决冲突。我们提供粮食作为让人民放下武器的条件，这一措施相当有效。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愿意再多加思考的问题。我们尽力集中在人道主义议程上，世界不希望看到人民挨饿。我们特别关切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受到威胁的非常易受伤害人民。我们尽力摆脱目前正在进行的所有其他政治辩论。但是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莫里斯先生的回答。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我想简单地谈 2 点意见，并向莫里斯先生提一个问题。第一，我愿感谢他明确的说明，我认为他的发言将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接下来我要谈第 2 点意见。主席先生，我要特别感谢你召开了今天关于我们方案的会议。我们现在认识到，南部非洲和该大陆其他地区的粮食局面对于非洲的安全有直接影响，同时安全——或者干脆说是不安全——对粮食局面产生消极影响。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安理会今后能够了解情况和具备能力至关重要，以便使其能够将同粮食安全相关的信息和其他因素融入其解决非洲冲突的办法。在这方面，我完全支持巴尔德斯大使的提议。我认为，安理会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不应谨小慎微或过于忧虑会超越我们的职权范围。

我向莫里斯先生提出的问题涉及索马里。他谈到非洲之角。索马里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该国正在经历严重的问题。非洲之角该国的粮食安全方面的局势如何？捐助国和各捐助方对索马里的态度如何？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同意同事们的意见，今天下午的简报会十分重要，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安理会就此向莫里斯先生领导的工作班子表示赞扬。这是一项庞大的团队工作，是所有联合国机构最令人钦佩的业绩。

我要再谈谈我们为何来安全理事会这里听取本次简报。我要问问莫里斯先生，他在这方面希望安全理事会做些什么。他说粮食计划署越来越多地关注症状而非根源，并在处理因饥饿和其他有关问题而产生的苦难。正如他所说，这意味着计划署越来越多地关注粮食问题，越来越无法——我认为他的话含蓄地表明了这一点——处理目前情况的根源。

然而，正如我从他的报告中获悉的那样，根源是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是紧急情况，根源是厄运或恶劣的气候造成的。因此，联合国系统应该对这些结构性根源采取若干行动，并处理全世界因缺乏粮食和健康而产生的苦难。的确，这是生产政策和粮食生产安排；的确，捐助活动总是不够；的确，我们需要两倍的资金和两倍的机构来从事这一切工作；但这项工作也会涉及同卫生问题特别是艾滋病毒/艾滋病、实地和平与安全、施政以及各种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不断地进行分析，莫里斯先生的口头或书面发言就是这样做的；但他以书面形式提出的七项

建议，以及他在发言最后口头提及的六项提议，确实不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它们是联合国大家庭，捐助国和实地各国政府的责任。但莫里斯先生最后谈到维持和平和外交问题至关重要。

我希望他或许举例表明安全理事会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我想到三个方面。一个当然是解决冲突。他指出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的情况有所改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的改善程度还不够好；科特迪瓦和其他地方的情况许有所恶化。利比里亚仍是一个问题，发生叛乱和战争的其他地方仍十分困难。

第二，存在着政治化和施政问题。也许这也是安全理事会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领域。

第三方面——我们尚未真正谈论这个方面，但我们应该在我们之间并同我们的姐妹组织讨论这个问题——即协调问题。如果在这个饥荒和苦难的情景后面不仅仅有气候问题、农业政策问题和农业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有卫生问题、施政问题、战争和各类其他问题的话，粮食计划署和安全理事会之间的相互运作是否应该谋求就回应办法进行协调？介入这些领域不全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应该做部分工作，因此要同其他方面合作完成各项任务。难道他没有看到目前迫切需要改善国际系统和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而其中很多问题又可能回到施政问题上？

莫里斯先生提到津巴布韦，因为它是比其他地区更糟糕的南部非洲地区之一。他没有说“不必要地”，但他也没有提到气候或偶然原因。那里有些问题从人道角度看可能会有所改善；非洲某些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正确的政策会使那里的情况立即有所改善。莫里斯先生在什么程度上认为安全理事会正在有所作为？鉴于他今天还有几分钟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到下次他回来同我们再次谈论这个问题前，他希望我们具体做些什么，使他从粮食计划署角度看到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而不是继续恶化？

梅内德斯女士（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先生你组织本次有意义的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我还要感谢莫里斯先生非常有意义的简报，他的简报简明扼要，但内容翔实。莫里斯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情况非常生动并显而易见。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

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许涉及格林斯托克大使刚才所说的话，但我们愿更具体地问一问：我们是否已从过去成功的事例和不那么成功的事例中，从已经避免和没有避免非洲饥荒的案例中有效吸取教训？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可否告诉我们，安全理事会如果就此做了什么的话，做了哪些事情，今后还可能采取什么行动？

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莫里斯先生列入其简报的概念，他的第一轮回答我们问题时顺便谈到这个概念。这就是充实能力概念。他说过目前很难制定能力建设政策，例如，在父母死亡或生病，无法将其农业知识传给其子女时。粮食计划署是否单独地或同其他机构合作，考虑过我认为莫里斯先生早些时候提及的充实能力构想？

杜克罗斯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也对莫里斯先生作极为有意义的发言向他表示感谢，我认为他的发言载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和数字，表达了人类经验意识。

我们也极为重视非洲粮食危机问题。正如莫里斯先生所说，我们希望利用我们八国集团的领导地位，把这个问题置于其议程的首要位置。

关于莫里斯先生的简报，我认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他就造成这场危机和使其进一步恶化的各种因素彼此相互运作所说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为震惊。我的同事们在此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到造成粮食危机的种种因素。

我对莫里斯先生谈了很多南部非洲的问题感到印象深刻。南部非洲地区也许包含了非洲当前粮食局势中的最令人担心的因素。可能是因为该地区没有为大规模饥荒做好准备——或是准备程度不如其它地区——并且因为艾滋病造成的破坏在那里最明显，其

严重程度也许最紧迫地促使我们提出以下问题，目前死亡的人数是否会损害今后的生活和这些社会今后恢复的能力。

莫里斯先生说，他想要集中注意粮食问题的人道主义方面。因此，我们不应当问他太多的总战略或相关问题。但是，我们要问的所有问题自然会涉及以下方面，在这些特别可怕的情况下，是否需要重新考虑国际社会对这些社会的总战略？这是一个无法在几分钟的讨论中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这方面，我谨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例如，根据他的经验，莫里斯先生是否认为南部非洲——我认为这是最明显和最说明问题的情况——所有国际社会的主要行动者之间实际上在进行必要的协调，还是需要进一步集中精力，从他提到的不同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感谢莫里斯先生的关心。

我也许还要说，我也对以后莫里斯先生就伊拉克进行的通报感兴趣。但是，我也希望他象其刚才建议的那样，在今天下午向我们提供一些初步的情况。

迪亚洛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谨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詹姆士·莫里斯先生有关非洲粮食危机的非常丰富和启发性的通报表示充分的赞赏。莫里斯先生上次就这一问题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是 2002 年 12 月 3 日。他刚才的通报使人得到普遍的印象，情况不是太妙。相反，情况很糟。正如他所说，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几个不同的原因，非洲粮食局势日益使人感到震惊。

我的问题涉及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非洲的粮食危机。非洲粮食安全斗争中的各个行动者之间是否在进行协调？如果在协调，是如何进行的？如果没有协调，能否建立一个可行的机制，提高这一斗争的效力？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向莫里斯先生表示欢迎，并对他内容非常丰富的通报表示满意。这是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之一，并是安全理事会没有花足够时间的一个问题。正如格林斯托克大使所提，安全理事会的责任有某些局限性。这个问题涉及国家的责任，正如德国的舒马赫大使所说，涉及善政。但是，尽管有这些局限，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以便我们能够澄清安理会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上可以发挥的作用。

莫里斯先生在发言一开始提到伊拉克的及时的问题。我们正在密切观测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石油换粮食计划范筹内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该署发挥了非常建设性的作用。我认为，莫里斯先生会同意我的看法，自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以来形势有了变化。我们认为，粮食计划署和人道主义机构可发挥新的作用，这个作用同石油换粮食计划中的作用不同。这是因为石油换粮食计划只限于满足伊拉克人民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和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情况下的需求。但是，现在一切情况都变了。正在打仗。这场战争必须受到各项日内瓦公约的管辖，特别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利用伊拉克人民自己的资金来协助他们。我们不应当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来喂饱的他们。应当使用国际资金。粮食计划署现在是否拥有必要的资金来满足战争造成的新的需求？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莫里斯先生到这里来。他到安全理事会来并不是偶然的。人们也许要问为什么。莫里斯先生处理粮食问题；安全理事会处理和平与安全。然而，他到这里来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格林斯托克大使谈到的情况确立了这方面的联系。

我想，莫里斯先生在发言的一个地方说过，非洲需要的是一场绿色革命，也就是同我们所看到的也许是红色的革命——我们看到大量流血——相反的一种革命。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在许多地方存在的粮食供应不足、饥荒和危机局势常常造成引起动乱的条件。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我也注意到莫里斯先生提到的一点：世界粮食计划署 80%的资源用于紧急局势，也就是粮食分配。只有 20%的资源用于发展，也

就是粮食生产或处理其他情况。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对早期预警系统进行更多的投资，需要依靠这种系统来预防一些粮食危机局势。我的问题是，这种趋势如何改变？莫里斯先生的想法如何演变，即我们更多地关注粮食生产和对发展投入更多的资源，以便为粮食生产创造条件，而不是处理紧急情况。不错，有些局势属于紧急状况。但是，在其中一些局势——有些已经提到过，其中有一个是在我国——中，我们将渡过危机局势，进入后冲突局势，我们所说的 80%或许会减少。

我们现在正朝哪个方向走呢？换言之，我们是否正在发展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减少其他方面的投资、从而进行莫里斯先生所说的绿色革命？

张义山先生（中国）：刚才我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莫里斯先生的报告，他的报告介绍得非常详细，对于我们了解非洲的食品形势非常有好处。但是，应该承认，他所给我们介绍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景象，是一个有 4 000 万人缺食少粮、营养不足的景象。当然，如果没有莫里斯先生和他的同事的勤恳努力，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景象可能会更加令人吃惊，更加凄惨。

在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用普通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你把鱼送给一个人，他只能当一顿饭吃。但是，如果你教他如何去抓鱼，那么，他可能一生都会过上舒服日子。所以，很显然，除了救济之外，如果能够教人如何捕鱼，才是更好地解决贫困和解决粮食缺乏的有效办法。

我想了解一下，WFP 是不是和其他联合国援助机构共同合作，从而能够增强灾民的自立能力，使紧急援助能够有更好的效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以墨西哥代表身份谈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

正如莫里斯先生直率地显示，南部非洲和非洲其他地区的粮食局面显然使我们感到困惑，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充分履行一项承诺。但是，粮食安全既是道义责任所在，也是巨大挑战，必须通过在该地区进行深刻改革，解决这个问题。

显然，人类具有获得健康和均衡食品的神圣权利。为此目的，眼前的挑战就是增加可持续粮食生产，并且在此基础上向最脆弱人群提供这种生产的成果。在非洲，必须在特别不利的环境中实现这个目标，那里出现了土壤退化、荒漠化以及正如莫里斯先生指出，那里不断发生自然灾害、疾病传染、暴力冲突、内乱——内乱遗留的问题和造成的影响代代相传，从耕地里存在爆炸物和地雷这种简单事项中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和影响——气候变化、以及同样严重的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以及疟疾和肺病等其他疾病流行，这些疾病也破坏了社会的生产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而且鉴于已经引述的各种内外因素，国际社会需要作出承诺。莫里斯先生指出，需要 18 亿美元，这似乎是一个巨大数字，但是，与今日全世界军事支出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大，世界军事支出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鉴于所有这些因素，我谨强调格林斯托克大使提出的问题。从那个角度看，而且考虑到所有因素，依莫里斯先生看，除已经制定的眼前任务外，安全理事会现在可以开展哪些活动、动员捐助者和促进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项目的重视？依莫里斯先生看，安全理事会应该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共同开展哪些活动、以解决他向我们叙述的如此巨大的危机？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身份。

下面请莫里斯先生发言。

莫里斯先生（*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两轮提问都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安理会所有成员对我们的工作考虑甚多，这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我们的同事们是很大的鼓舞。显然，我今天下午无法给安理会各位成员提出他们应该得到的答复。一如我们上次所做的那样，我们将以书面形式相当详细地回答所有问题；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答复。

保加利亚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索马里的问题。索马里局势非常令人不安，在那里开展工作非常、非常困难，鉴于那里存在的冲突，很难评估困难的程度。我们在那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我们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服务作业地点之一。今年我们的方案要为该国国内 300 万人提供口粮。过去我们相当成功，筹得我们在那里工作所需资源近 75%。令人鼓舞的是，这是我们拥有非常广泛的支持基础的地点之一，将近 20 个国家帮助我们在索马里的工作。

联合王国提出一个问题。首先让我感谢杰里米爵士一同事——安东尼·比埃地，他是我们执行理事会今年的主席。他能力和效率过人，非常杰出。问题涉及结构性问题。显然，每一层次都有结构性问题。有影响农户，有影响市场推销，影响农业赖以生存和繁荣的体制的结构性问题。联合王国代表问安全理事会能做些什么，这基本上也是主席提出的问题。首先，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可以帮助解决作为世界议程中心问题的人道主义问题，粮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如果能以人道方式待人，让人们有希望、机会、发挥潜力和文明生活的基本条件，我相信，安全问题将能得到减轻或减缓。因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对家庭、对儿童、对其他个人有极大的影响，它们拯救生命，维系生命，让人民能够开始成为富有生产力的公民。

对减少冲突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多想想这一道理。我感激安理会成员在思考这一问题；当他们同本国首都联系时，这就成了对话的一部分。通常我们与农业部联系，这很重要。当我们同外交部和财政部联系时，这些国家成为我们更加有力的伙伴合作的机会更大。

关于粮食援助政治化问题，我想，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即安全理事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有力发言，是非常有力、非常重要的。人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安理会成员的意见。必须声明，人们贫困时，有权获得食品，这是他或她应有的基本权利，这与个人政治意图无关。世界上能发表这一声明的最重要机构莫过于安理会。粮食、卫生和教育是安全的基础，个人好日子的基础。我们将再谈这一问题，我们将尽力给安理会成员一个最好的回答。这对我的同事们很有益。

西班牙代表提出经验教训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分配粮食。几年前，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出色地分配粮食，因此没有人饿死。我们知道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当时我还不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如何利用粮食促进预防、投资和发展。我们知道如何做这项工作。我们知道社区小团体对于做好工作的重要性，知道杰出的社区领导人的重要性。我们还发现，推广非粮食援助项目非常困难。我们已发现，把相等价值的资金用于种子、化肥和农具，长期而言，效果比直接买粮食更好。我无论如何不理解，让人们接受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么难？这令人费解。但我们懂得这一道理。

我们已发现早期预警和掌握情况的价值。我们知道，危机刚开始时的投入，比在危机开始后的投入更加有力，作用更大，而且是越早越好。我们已就经验教训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我们将同安理会成员交流。

还有人谈到建设能力政策。我猜我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是能力建设者。在阿富汗，我们确实曾提供粮食，用作对 150 000 名学校教师的报酬。那时阿富汗没有东西可用来支付教师。我们也曾用粮食来支付重建阿富汗政府机关。这样做还有其它的例子，但我们一般指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在这方面领头。

这里我必须谈协调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共同协作。在那一地区重建教育、农业和卫生能力至关重要，我们大家都必须出力。

法国代表问到协调问题。我不想笼统地回答这问题，但让我告诉各位，在南部非洲，合作程度非常可喜。联合国所有各机构，加上南部非洲区域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已经组成了一个所谓“联合国区域机构间协调支助办事处”（区域机构间协助

处）。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艾滋病方案)、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下的一个区域协调机构。有近 100 人一起工作，进行区域协调与合作。六国对这项倡议的反映是，非常有效。

南部非洲危机今后几个月仍将是一场粮食危机。我希望我们能够摆脱农业困境。今后南部非洲将面临一场与施政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相关的巨大危机。区域机构间协助处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如何制定我们今后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或许能部分回答几内亚代表提出的问题。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提出了一个有关伊拉克的问题，以及粮食计划署的新作用。让我感谢叙利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两个国家都已提供本国的粮食储备，共粮食计划署在伊拉克使用，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紧急和及时地向他们借用。我们始终会付还给他们，但有储备在手，对我们是一大帮助。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粮食计划署在伊拉克已开展工作达 12 年时间。我们是石油换粮食方案的主要实施者，直接在北部地区实施该方案，其对象是库尔德人，此外我们在该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帮助对该方案进行监测。我们一直在为应付目前的冲突作准备，我们在伊拉克周边国家预先存放了足够的粮食，可满足 200 万人 30 天的食物需要。因此，我们基本上把重点放在会逃向周边地区的难民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身上。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项为期六个月的方案。在第一个月，它的侧重点是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在 200 万至 400 万之间。我们正在研究如何确保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月提供可养活伊拉克全体居民——2 700 万人的粮食。

伊拉克引人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该国 60％的人中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提供粮食，100％的人依靠中央政府提供部分粮食。该国有一个很有效的公共分配制度，它有 44 000 个分配站，用于分发通过石油换粮食方案所获得的粮食收益。因此，我们将研究如何帮助确保有一个源源不断的运输线来提供足够的粮食资源，以便在第二、第三和第四个月提供伊拉克全体人民所需的粮食。随着第五和第六个月的到来，我们设想石油换粮食方案将会在伊拉克政府的管理下，充分恢复运作，而我们的责任将是继续照顾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非常脆弱的群体。我们为伊拉克境内非常脆弱的 70 万人提供粮食，包括孤儿、孕妇和哺乳母亲。

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是联合国的后勤臂膀。我们负责管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空运部门，我们管理着阿富汗境内的通讯系统——我们与埃里克松一道前往那里，在喀布尔架设了整个通讯系统——而且我们负责管理运输、卡车和燃料供应等事务。联合国大家庭在综合呼吁进程中共同要求在短期内为解决伊拉克人道主义问题提供 22 亿美元。为配合这一综合呼吁进程，我们要求提供 12 亿美元用于粮食，1 亿美元用于后勤活动。

根据安全理事会在一周前的星期五通过的 1472（2003）号决议，安理会授权我们使用通过石油换粮食方案专门保留的粮食收益，但它们必须在 45 天时间内运输。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分析合同，但是我们今天最理想的估计是，在这个 45 天的时间内，石油换粮食方案将提供价值 1.1 亿美元的粮食收益，用于为伊拉克人民提供粮食。我们显然非常希望安理会找到办法，将 45 天的期限延长，并且处理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但是就这些物品的运输费用来看，这些问题却是十分重要的。

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要求捐助者提供至少 11 亿美元，帮助资助方案的其他部分，而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我们与安理会许多成员国以及我们的所有捐助者进行了数十次商谈。可以说，这些商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想，按照目前的谈判情况，我们已经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半资金，我们在罗马有工作人员——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总部——但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使整个一揽子计划得到实施。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有时从作出承诺开始到实际购得并运输粮食以及将它送达某个人，可能需要两、三或四个月。因此，时机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许多国家已经做了慷慨的承诺；现在已有 11 个国家向我们作了承诺。我应该指出，这些承诺来自那些对冲突持有非常不同看法的国家。我们的长处之一是，我们将侧重的范围缩小到了人道主义问题上。人们对冲突可能会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任何人希望有人饿死，尤其是处于极度危险的非常脆弱的人。因此对冲突持不同看法的国家会乐于帮助我们。上星期，德国作出了一项提供帮助的重大承诺。我在柏林呆的两天令人非常愉快，对此我极为高兴。

我的安哥拉朋友提出了一个有关绿色革命的问题。我当时赞扬秘书长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那项承诺。在世界各地，目前的趋势是脱离对基本农业基础结构的投资：在 1988 年，全世界为该方案认捐了 140 亿美元；去年，全世界认捐了 80 亿美元。现在有一些好消息：美国和联合王国都已开始调转它们在这方面的投资。去年，美国投资用于基本农业基础结构的资金比前一年多 2 亿美元。因此有关趋势是向下的，但现在出现了一线希望，即它正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

就有关埃塞俄比亚的问题而言，有人问我：“吉姆，此事怎么会再次发生？”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投资以前用在紧急救济上，而不是预防和发展方面。我认为我们正开始汲取这一经验教训。我们正与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其他组织密切合作。

关于中国代表提出的问题，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已长达 40 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例。中国在发挥市场作用方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事例之一；那里数年前没有解决温饱的数亿人现在他们已解决温饱。联合国各机构一道开展了很好的协作；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开展合作，自力更生能力的概念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主席先生，在我解答联合王国代表的问题时，我也力图解答你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对于安理会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一道更密切地开展协作，将会提供一个周详的答案。我感谢所作的主动提议，我们将努力提供一个好的答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莫里斯先生所作的评论以及他对我提出的有关今天下午会议议题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我尤其要感谢他愿意回答与未列入议程的其他项目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伊拉克局势的问题。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表示，希望安理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继续与莫里斯先生就伊拉克局势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发挥的作用，开展对话。主席将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以及莫里斯先生进行协商，考虑他是否能够在近期内——在他返回计划署罗马总部之前——与安理会就这方面进行协商。

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讨论。

下午 5 时 10 分散会